

绿色世界史



环境与伟大文明的 衰落

[英] 克莱夫·庞廷 著

王 毅 张学广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 GREEN HISTORY OF THE WORLD

THE ENVIRONMENT AND COLLAPSE OF GREAT CIVILIZATION

绿色世界史

环境与伟大文明的 衰落

[英] 克莱夫·庞廷 著

王毅 张学广 译

A
GREEN
HISTORY
OF
THE
WORLD

THE
ENVIRONMENT
AND
COLLAPSE
OF
GREAT
CIVILIZATION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英)庞廷(Ponting, C.)著;
王毅,张学广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书名原文:A Green History of the World

ISBN 7-208-04151-2

I. 绿... II. ①庞...②王...③张... III. 环境保护-影响-社会发展-研究 IV. ①X2②K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5654 号

责任编辑 顾兆敏

特约编辑 黄明辉

封面装帧 王晓阳

绿色世界史

——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

[英]克莱夫·庞廷 著

王毅 张学广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4.5 插页 5 字数 368,000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00

ISBN 7-208-04151-2/K·949

定价 25.00 元





献给帕特里克和雪莉·里弗斯

译者序

“绿色”在今天是一个时尚、是能够显示素质和品位的名词。保护环境的观念,已经由专业人士、知识分子深入到一般民众之中,由发达国家普及到众多第三世界国家。从舆论著述到措施行动,从头脑峰会到国际公约,从个人生活习惯到志愿者组织,“绿色”意识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一点也不前卫了。那么,本书的独特性何在?在那么多的环保论著中,有什么必要再来添上这样一本呢?作者克莱夫·庞廷先生强调,尽管已经有很多关于目前环境状况和未来前景的著作,但很少有人深入到过去或者是探索在何种程度上环境塑造了人类的历史,没有一本书覆盖了这个方面。所以,他强烈地感觉到有一种需要:撰写一本“绿色世界史”。

从“绿色”的角度来审视世界历史,这本身就令人兴奋,颇感新鲜。对于什么是历史,人们无疑会有多个角度、不同层面的理解重心与阐释思路,但是,我们通常注重的似乎是历史长河中那些活跃的、显而易见的东西,那些戏剧性、故事化,以单个人为焦点的事件与过程,据此写出了一本本社会史、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然而,在庞廷先生看来,人类 200 万年的存在历史,这些方面并不是真正基础性的。他想写作的是“绿色”层面的人类史——人类及其创造的各种社会与之存在于其中的环境、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演变及其后果。的确,在这样的一个层面上,我们耳熟能详,以至于下意识中就把他们当作了历史构成的那些帝王将相、英雄豪杰、伟大人物、哲人智者,或者是遗臭万年的枭雄奸邪,就显得那样微不足道,

身不由己、无足轻重了。他们上演的一幕幕活剧,与这条沉缓流淌的历史河流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顶多不过是旋起旋灭的细碎浪花罢了。

这样来考察历史,来考察这样的历史,无疑必须是一种大尺度的时空观念。看看本书的章节目录及其内容要点,从一般所认为的150万年人类直接祖先的走出非洲,到农业在世界的三个核心地区——西南亚、中国和中美洲的发生;从欧洲的扩张到工业化社会的建立,我们会鲜明感受到这种开阔的视野。同时,在这样的考察中,作者又介绍并强调了与我们传统理解颇有不同的若干观点。

比如,采集和狩猎作为人类的基本生存方式,一直延续到大约1万年前农业发展起来。对此,我们习惯于视为蒙昧,是落后生产力制约下的不得已。但是,最近30年中,对现存的采集和狩猎部族的研究却表明,人类在其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所采用的这种生存方式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糟,对于采集和狩猎,我们应该有一种积极得多的看法。一般而言,采集者和狩猎者们并不生活在持续的饥饿威胁之下。相反,他们有着营养充足的食谱,这是从一个可以得到的范围很广的食物源中挑选而来的。丰富的多种多样的食物,通常只是环境中可以得到的食物总量的一个很小部分。获取食物和其他形式的劳作,通常只占一天时光的很小一部分,留下了大量的时间可用于消闲和祭祀活动。绝大多数部族靠着很少的物质就可以生存下来,因为他们的需要很少,也因为他们发现额外的物质是自己那种流动生活方式的累赘。总之,这种生存方式能够较好地融入环境,能够轻松地不同生态系统中获取食物,对生态系统的扰乱或破坏程度很小,并给人们留下了相当多的闲暇。这大约也就是这种生存方式能够维持那么长的历史阶段的根本原因吧。

那么,为什么又发生了从采集和狩猎方式朝向农业的人类历史的这第一次大转变呢?我们通常将此理解为进步,是生产力发展的积极成果,是人类千万年努力追求,好不容易才实现的一场革命。农

业提供了那么多明显的长处,一旦人类的知识和文化进步达到了相应的水平,他们马上就采用了农业。然而,这种思路现在已在很大程度上被抛弃了。解释采用农业的一种新理论,是将其与最后一次冰期结束时所发生的气候变化联系起来。气候的改变导致了植物带的巨大变化,从而影响到人类所能进行开发的各种资源及其开发方式;更重要的则是逐渐增长的人口压力。尽管采集和狩猎部族采取了包括杀婴在内的一系列措施来限制人口,想把它保持在一个环境可以支撑的水平上,但他们这样做并不总是成功的。人口过多,一个部族业已占据的那片土地就无法支撑,就需要分离出新的部落,去开发新的地方。一些部族最终不得不进入自然资源不那么丰裕的居住地,必须采用强度大得多、时间多得多的方式来开发自然环境,获取食物,最终导致了如今被称作农业的这种方式的产生。一旦这些部族达到别无选择必须采用农业技术方式时,就进入了一种不可逆转的棘齿效应:粮食产量会增长,可以养活更多人口;而由于缺乏人口的控制,更多的人口就会形成更大压力,要求着强度更大的种植,这就意味着再也不可能回到采集和狩猎的生存方式了。所以,农业的发生其实才是一种不得已,人类社会并不是为了发明“农业”和永久性定居而创立出来的。

作者的一个基本思路就是:人类的行为塑造着一代接一代的人类和不同社会居住于其中的这个环境。这些行为背后的驱动力非常简单,那就是需要——随着人口数量的逐步增长,需要给他们以食物、衣物和居所。由采集和狩猎发展到农业,又从农业发展到工业,再从传统农业和工业发展到现代农业和工业,一直是这样一个在养活人口和物质享受的压力驱使下,逐渐强化人工改变环境,干预自然生态系统的过程。

为了人类的需要和利益而干预自然生态系统,几千年来的人类文明,不仅在行动上是这样过程的强化,而且,在观念上和思想上也都进行着一种人类中心论的论证。本书的第八章“思维的不同

方式”，分析了欧洲传统中如何看待人类与大自然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那些古希腊和罗马的哲学家，基督教从犹太教起源上继承下来的那些观念，都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信念：人类应放置在一个支配自然界其他部分的位置之上，自然界的其他部分从属于人类。17世纪后缓慢发展起来的科学也加强着这一思路，笛卡儿、牛顿和培根事实上都在进行或是支持着这种强调；在描绘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时，“掌握”、“征服”和“支配”这样的词汇是相当普遍的。

从这个角度，作者对作为现代西方工业化社会基本理论支柱的古典经济学及其现代体系也进行了批评，认为它们有着一个重大缺陷：全都忽略了资源损耗的问题，而仅仅是在处理不同的竞争力之间的资源分配这个第二位的问题。它们把地球上的资源视为像资金一样，是可以转变为利润来源的资产配置。树木、野生动物、矿产、水和土地都被视为商品，可以买卖或者进一步加工，而价格仅仅是榨取这些资源，把它们转化为市场商品的花费而已。然而，这种观点忽视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地球上的资源不仅是稀少的，而且是有限的。由于古典经济学未能把这个事实放到它的分析之中去，建立在它之上的经济体系就鼓励生产者和消费者去尽量使用目前条件所能提供的任何资源。它蔑视所有逻辑地假设，认为以物质和能量形式体现着的资源是无穷无尽的，经济总体水平的增长能够永远持续下去，某种物质或者是某种形式的能量为另外一种所替代，这能够无限地延续下去。然而，总量供应事实上有限。不是吗？现在对它们的消费有着一种真实的代价——未来的子孙后代就得不到它们了。

经济学家们发展出了国民生产总值 GNP 作为对生产、消费和投资数量的测量，一种经济是否成功，现在通常就以 GNP 的增长速率来判断。然而，它测量一种经济的成败，其中却包括了许多对于一个社会作为整体来说并没有益处的东西。比如，汽车的寿命越短，越是经常出毛病，它在一种经济中的活动量就越大——有更多

的汽车销售和更多的汽车修理,并反映在 GNP 数字中。这就蔑视着一个事实:如果一个人有更为可靠、更为经久耐用的汽车的话,他的生活一定会更好;社会整体如果有质量更高的汽车,虽然汽车厂或者修理铺会开工不足,显得萧条,但人类所拥有的资源和能源总量会维持更长时间,在根本上对人类更为有利。就长期而言,GNP 的观念没有考虑到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其速度是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是人们事实上想要的,或者是可以维持的,更不必说未来的持续增长了。

作者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进行了批评,认为他们在对待资源和环境的问题上采纳了古典经济学(以及此前的西方思想)的许多假定,只注意到了任何产品的“价值”都来自人类注入其中的劳动量,而忽略了所涉及的资源,只是以涉及的人类榨取它们和拥有它们所付出的劳动量而评估“价值”,而没有考虑它们的有限性质。不过,马恩在人与环境的问题上,看法似乎并非这样简单。不知为什么像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说过的这段话没有被作者注意到:“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美索不达米亚、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的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在此坡被十分细心地保护的松林,他们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高山牲畜业的基础给摧毁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恩格斯在 100 多年前就对人类提出了这种忠告,而本书用大量事实分析农业在世界的三个核心地区展开后所造成的环境后果,论证的正是这一点。这种材料其

实应该进入作者的视野。

法兰克福学派著名学者霍克海默在《理性的黯然失色》一书中认为,理性可以分为主观理性(工具理性)和客观理性。主观理性是一种限于工具而非目的之领域的理性,它追求知识,追求工具的效率和各种行动方案的“正确”抉择。当培根强调“知识就是力量”时,他所意指的就是这样一种主观理性和工具理性,也正是它,指导着当代西方的工业文明。而所谓客观理性,指的是“一个包括人和他的目的在内的所有存在的综合系统或等级观念,人类生活的理性程度由其与这一整体的和谐所决定。正是它的客观结构,而不是人和他的目的,是个体思想和行为的量尺。在这里,关键的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客观理性具有本体论上的意义,作为世界的客观秩序,它决定着万事万物的存在与发展,承担着理性地决定人类的美好生活究竟是什么的任务。然而,几个世纪来,一直是技术高度发展的工具理性时代,在工具理性中,人作为主体,高居于所有的客体之上,把世界看作是一个可以被操纵和统治的集合体,世界也开始以一种新的图景出现,每一件东西都是可通约、可替代的,它是一堆无生命的、冰冷冷的东西的聚集,可由纯粹的主体所操纵统治。

对于人的心灵本性究竟是什么,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认为,把人看作是理性的动物,这是一个古老的普遍的根本性错误。理性只是心灵的外观,潜藏在它后面的是一个意志的世界。这个意志,“本质是没有任何目的、一切止境,它是一个无尽追求”。就个体而言,就是攫取食物以求温饱,发展自身以求生长,战胜他物以求生存,占有异性以求繁衍;就种族而言,就是通过个体的不断繁殖而求种族的发展和永存。叔本华认为,唯有这个无意识的盲目的生存意志才是心灵的真正的本质,人的真正的本质。

在翻译过程中,我感觉到,尽管没有像叔本华和霍克海默这样明确道出,但庞廷先生实质上是认同这种颇显悲观和悲凉的见解的。罗马俱乐部在20世纪70年代发表过一个著名的研究报告《增长的

极限》，考察了加速工业化、人口快速增长、普遍的营养不良、不可再生的资源耗尽、环境的加速恶化这全球五大因素的变化趋势，以及它们在同一个系统里的相互作用，悲观地认为人类生存危机即将到来。现在看来，问题似乎还不那么严重，还有相当的空间。然而，庞廷先生认为，尽管在不久的将来由于世界原材料和能源的耗竭而导致人类面临全球危机和社会崩溃，这种可能性似乎不大，但这些问题，乃至工业化社会的前景，在未来的某一时刻肯定会遇到；而当前严重的直接压力则是社会所依赖的一些至关重要的资源如全球环境调节机制、土壤、水、空气和生物多样性的退化和破坏。

从“绿色”的角度来看人类历史，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人口数量的增长远远超过了自然生态系统可以支撑的程度。衣食住行，还有随之而来并越来越高的娱乐和奢侈要求，所有这些，在根本上都在惊扰和破坏着自然生态系统，造成不可以逆转的资源 and 能源的数量减少和质量恶化。的确，从我们习惯的那个角度来看，新技术的发明、更复杂的生产过程和更多能源的利用，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进步——人类社会通过创造发明来控制 and 改变环境以满足自己需要的能力的增长，是回应挑战、解决问题的潜力的显示。但从生态学角度看，这个过程又表现为满足人类同一基本需要的一系列更为复杂、为害更烈的破坏环境。

人类社会到目前还没有崩溃这一事实，并不保证崩溃将不会发生。以往的许多社会都相信自己可以长存，可以找到并采用能够永久持续下去的生活方式，但结局并非如此。自然环境的一些损害不可避免，一些退化也可以容忍，但挑战在于：要预测和辨识出当人类对环境的需求达到什么样的临界点时环境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并及时做出相应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调整。一些社会相对成功地找到了这种平衡，另外一些社会却失败了。从这种视野来看，现代工业化社会以其极高的能源和资源消耗速度以及随之而来的极高的污染程度，加以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口迅速增长，断定它为生态上是可持续

的,这显然为时过早,以往的人类行为已经给当代社会留下了一堆几乎难以逾越的有待解决的困难。

本书前面部分翻译完后,在一次公款宴请中,看到满桌堆积的菜肴,主客之间轮番劝酒,劝的人那般热情固执,被逼着喝的人实在不想喝,皱着眉头一仰脖子,完全是一副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凛然神情,我于是开了句玩笑:“真不想喝就算了,我们适度消费吧。”谁知,在座的好几位就批评我起来:现在应该拉动经济,提倡消费,没有消费哪来的经济发展?大家都不喝酒,那酒厂岂不倒闭关门?工人们怎么办?自然,他们是半真半假地开玩笑,但这种观念现在却很流行。前些年在开发矿产资源上提出过“有水快流”,如今想方设法地“拉动内需”,刺激消费,像汽车这样的昂贵消费品也要尽可能地降低门槛,让它走进千家万户。的确,马克思强调过消费对于生产的决定作用,但由消费刺激起来的生产真的会是一个可以永远加速转动下去的轮子?而这种加速转动又真的是人类生存、人类快乐必不可少的吗?真的在支持着人类向前的发展进步、繁荣昌盛吗?认真想一想,恐怕每个人都不敢自信地说出一个“是”字。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上逐步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1972年,斯德哥尔摩环境大会明确提出社会发展同环境、生态的协调问题;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受联合国委托,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就世界面临的“环境与发展”问题出版了专题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该报告提出,可持续发展是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环境与发展问题的根本原则。之后,世界资源研究所(WRI)、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IIED)、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宣称:“可持续发展是我们的原则。”这一报告在1987年联合国第42届联大通过,成为世界各国在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方面的纲领性文件。1991年,在北京召开了“发展中国家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通过了《北京宣言》;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了“人类要生存,地球要拯救,环境与发展必须协调”的口号,通过

了《里约宣言》、《21 世纪议程》和《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等一系列重要文件,签署了《气候变化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近年,又达成了有关二氧化碳排放问题的《京都议定书》。

所谓“可持续发展”,《我们共同的未来》强调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可能。其核心内容就是:在协调好人与自然关系的前提下,提高人的生活质量;缓解人与自然的矛盾冲突;在满足当代需要的同时,保证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它强调自然、经济和社会的协调统一,包括自然的持续性、经济的持续性和社会的持续性。自然持续性指维持健康的自然过程,保护自然环境的生产潜力和功能,维持其自然秩序。经济持续性指保证经济稳定的增长,特别是迅速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收入,使环境和资源具有明显的经济内涵。社会持续性是指长期满足社会的基本需要,保证同代人之间、不同代人之间在资源和收入上的公平分配。报告从政策的高度提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必须做到的七件大事: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解决贫困问题;改善增长的质量,改变以破坏环境和资源为代价的发展现状;千方百计地满足人民对就业、粮食、能源、住房、水、卫生、保健等方面的需要;把人口限制在可持续发展水平;保护和加强资源基础;技术发展要与环境保护相适应。

然而,经济的持续发展、技术的持续发展与发展本身的“可持续”,有没有一种内在的深刻矛盾?二者是正比关系还是反比关系?庞廷先生认为,尽管 20 世纪尤其是最近几十年的政治、社会或文化史,可以归结为对发展后果的逐渐醒悟,已经形成了对环境保护观念更感兴趣的趋势,但这样的思想趋势还没有代替 2000 年来在西方思想中根深蒂固的将分离的“自然界”看作供人类利用的基本哲学,仍然是将持续的工业化和进一步的经济增长看作是任何环境改善的前提条件;相对于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的实质而言,许多措施是治标不治本的,只是在延缓或稀释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作为发展动力和结

果的技术,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它本身并非中性的,它远不只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或工具体系,它在体现技术判断的同时,也体现了价值判断,从更深的理论层次来说,有它作为伦理与政治问题的丰富含义;而且,它还有着自己的发展力量,常常牵制着人,并不以人的意愿而停止。技术中性论假定技术的设计者和使用者能够完全理解技术的目的。但事实上,技术的大部分后果是难以预见的。一个发明与创新导致另一个发明与创新,新的发明可能与原来的打算根本无关。当代生活的一个特点是,因为有了技术,所以就连续地产生了技术的新的应用与使用。不仅如此,越来越明显的是,技术有一些次级、第三级甚至更多级的影响,它们将对自然乃至社会文化产生严重的影响。但是,这些影响由于其长期性和范围的广泛性而难以预测。技术的后果与影响是内在于技术的,它们埋藏在技术之中,而不管设计者是否完全意识到它们。技术精神这样一种永不停歇的浮士德精神,可能正是诱使人类把灵魂抵押给了它的魔鬼。

生态学作为一门科学,是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于 1886 年创立的。生态学这个词由希腊语的“房子、住所”派生而来。海克尔把生态学定义为研究有机体及其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他指出:“我们可以把生态学理解为关于有机体与周围外部世界的关系的一般学科,外部世界是广义的生存条件。”当生态学发展到人和自然普遍的相互作用问题的研究层次时,它就已经具有了哲学的性质和资格,已经成为人们认识世界的理论视野和思维方式,具有了世界观、道德观和价值观的性质。当然,具体到各个国家自身的生存,尤其是那些发展中国家,对于它们来说,经济增长就意味着眼下直接的生存需求的满足,当生态问题尚未直接危及人的生存时,它们必然更多地关注和追求经济增长目标,而通过高投入、高消耗来达到高产出,又是最立竿见影的。一个偏僻山村,林木茂密,或者是山中有矿藏,砍倒大树,挖出铁矿,村里那些七八岁的孩子们马上就有了学费,患白内障的老人可以去治治眼,20 好几的小伙子有钱娶媳妇了。这时,生态学的

世界观和价值观,局外人的环境保护宣传,能起多大作用呢?然而,山秃了,环境破坏了,水源污染了,30年后,50年后,这个村子就只有整体搬迁,这块地方就必须抛弃。但现在村民们能够顾及这些吗?这真是一种两难处境。

我是非常赞同这样一种根本观念的转变的:形成一种“深层生态学”的智慧。这种智慧以系统理论作为科学基础,但超越了科学的框架,而与东方的宗教哲学非常接近。(我们用不着妄自菲薄,在中国古代的儒道世界观中,都可以看到某种朴素的对于生态环境存在的直觉和保护它的生态智慧,如“天人合德”、“自然无为”的提法。著名的中国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博士就坚信道家所言“无为”并非不做事,而是不违背自然:“我相信,大多数汉学家在这里是都弄错了;就早期原始科学的道家哲学而言,无为的意识就是不做违反自然的的活动,亦即不固执地要违反事物的本性,不强使物质完成它们所不适合的功能。”另外,在佛家所讲的尊重生命和慈悲中,也有着宇宙观、价值观层面上的生态意义。庞廷先生这本书中,就谈到了东方思想中的这种态度。)这种智慧要达到对全部生命总体与宇宙秩序相联系的意识,通过人对自己在地球生态系统及宇宙中的角色的体验,以求超越世俗生活的深刻转变,实现从过度的物质消耗到自愿的简朴生活,从经济和技术增长到精神的发育和成长的转变,在符合生态要求的前提下去创造健康、丰富的新生活,自觉地促进自然生命力的周期性再生和更新。

我所在的这个城市是以绿化、环境优良而闻名全国的,甚至是中国第一个获得联合国公布的“全球环境保护 500 佳”的地方。但是,尽管胜过水泥森林,但那一片片总是需要人工浇灌自来水,总是有扎着头巾、戴着口罩的女工用轰轰作响,冒着黑烟的剪草机来修剪的人造草坪,能够与虽然不那么整齐美观,但却生机茂盛的原野青山相比吗?何者能够真正持续下去?无疑,建广场修草坪比形成垃圾丢弃场要强得多,但问题的关键更在于我们能不能在根本上少制造一些